

中国经济安全与国际金融制度改革之实证研究

乔 生

摘要：美国金融危机反映了国际金融制度不仅违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且实际上构成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威胁。国际金融制度改革尽管在操作上应当坚持阶段论，考虑数十年形成的美元核心地位，但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不容逆转，改革的指导思想应建立在等值经济的基础上，而非继续奉行美国式的市场经济理论及新自由主义。

关键词：金融危机；经济安全；国际金融制度；等值经济；新自由主义

一、文献综述

1. 关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性质

如何认识美国金融危机的性质，是关系到采取什么措施抵御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及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如何保障自身经济安全的问题。但是，自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破产，7月美国标准普尔和穆迪两大评估机构降低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评级，8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两房”被强行国有化，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美林和华盛顿互惠银行被收购、高盛和摩根史丹利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引发新一轮金融恐慌，欧洲银行业陷入动荡以来，我国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性质的认识，除国纪平认为“本质上是美国模式市场经济治理思想的严重危机”^①外，多数学者并没有从思想理论的角度认识其问题。但也有学者取等一态度，把美国金融危机的性质圈定为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如认为“虽然出现这个危机的原因源于美国，而且这次危机的爆发和触发这次危机爆发的因素也来自美国，但是这不是一个美国金融体系危机，而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②这种认识实际上混淆了事物的“性质”“本质”与该事物“反映”何问题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说美国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这是正确的说法；但说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就难免有“顾左右而言他”之嫌。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一种金融欺诈，是虚拟经济的恶性膨胀，是新自由主义精英经济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一场闹剧。据田伯平（2008）披露，美国金融机构发放的实物与贷款不到20万亿美元，但其衍生金融产品却达到了400万亿美元。2000年全球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交易总额仅100万亿美元，2007年则达到67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0倍。至于责任则如同2007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之一的埃里克·马斯金（2008）所坦言：“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责任在政府的监管失误。”

2. 关于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初，伴随着应对金融危机的讨论，从7国集团到20国集团，从欧元区15国峰会到欧盟27国首脑秋季会议，都提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制的动议。欧盟轮值主席法国总统萨科齐表示“支持根本改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表示“不能容忍对冲基金，逃税天堂和运营不受监管的金融机构的存在”。英国首相布朗更是呼吁“建立新的金融体系，要以当年成立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眼光来整顿一直以来由美国倡导、欧洲国家跟随的西方金融体制”。金砖四国（中、俄、巴、印）则希望在国际金融领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卡恩对近期建立新的金融体系表示了不可为的态度，甚至对建立全球金融预警体制表示怀疑：“不相信可以设立这样一种具有红灯和绿灯且红绿灯有时还能在国家间逐个变换的机制。”应对卡恩的意见，欧盟率先推出金融改革“路线图”，包括四大要点和五项优先内容。以《后凯恩斯经济学刊》编辑保罗·戴维森和廖子光教授为首的众经济学家则向20国集团发出公开信，建议重新审视凯恩斯理论，建立国际新金融体系，包括构建没有货币霸权的全球货币体系，构建支持国家内部发展的国际贸易事务，创造能够刺激各国提高本国就业和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全球经济环境。

中国对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舆论，从一开始周正庆、蒋正华力主“改变由美国主导的旧的金融秩序，探索建立新金融体系，新的金融体制”，到后来学者普遍采取谨慎的态度。陈凤英等认为“现在还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美元的货币”，“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多元或多样的货币机制”，因此，改变美元体制和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难度很大。田德

[基金项目] 本文受南京财经大学重点项目资助（A0502）。

乔生：南京财经大学 WTO 研究中心 210046 电子信箱：qiaolaw@sina.com。

文认为“创建新体制为时尚早”。肖炼也认为虽然金融危机对美国金融造成重创，但对主体经济并无严重影响，“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替代的。”^③上述主张目前已经成为我国舆论的主流，并深刻地影响着下一代，许多国际法研究生便持有这一观点。但20国峰会前夕，我国央行行长提出了改革国际金融体制的主张，向世界表明了中国的态度。

3. 关于国家经济安全

中国政府白皮书《中国的和平发展之路》曾提出尽可能消除或降低金融风险、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④胡锦涛总书记又指出要更加关注能源、水资源、环境资源、全球气候变暖及关系民生的食品、卫生、公共健康等问题。^⑤学术界关于国际金融体制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目前仍然表现为零碎研究。尤其是对以美元体制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对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在威胁及可能造成的障碍，并没有充分而确定的认识。

二、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安全是国家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也是国家关系最基本的价值诉求。而美国金融危机是一种对银行信用的滥用，华尔街的精英们用预期收益向银行抵押贷款，银行把贷款转让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再打包成抵押债券向投资者发行，而金融机构则向投资者提供避险工具，避险工具再打包发行。所有的买卖均建立在未来预期收益的基础上，形成庞大的不以实际资本为基础的虚拟经济。当预期收益是虚假时，所有信用资产就成为泡沫，随时化为乌有。尽管精英统治将其美名为金融创新，但其实质是一种欺诈。

美国金融信用的欺诈性质，决定了危机发生以后作为债务人的美国本身伤害不大，相反对于债权人，包括中国等各国，损害却不容忽视。即美国虚拟经济经营的是别人资产的金融公司，破的是别人的产。如对中国已发生的实际影响，就包括：（1）政府持有的1.9余万亿美元储备严重缩水。其中约922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国债5410亿美元，机构债3810亿美元）成为泡沫，3700亿美元投入美国“两房”公司更是令人担忧。某些殖民化经济陷入资源与美元“双空”的困局，相关企业一方面为美国经济透支了国内资源，另一方面持有的是美国的泡沫经济产品。而金融危机中的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还将持续走高，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将继续降低，资产缩水的趋势日益严重。（2）经济“走出去”的企业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严重亏损。中投公司投资黑石产生了20亿美元的浮亏，中资银行由于雷曼兄弟破产损失数亿美元，连一贯稳健的联想集团也难逃其厄，出现“巨额亏损”后寄望董事长出山力挽狂澜。（3）外贸依存度平均高达60%、逼近警戒线的中国经济，由于2008年第三季度及2009年出口锐减25%或以上，出现了包括老百姓收入降低、失业人数增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十年前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因为相关国家推行出口导向战略，外贸依存度连年攀高，最后国内经济滑坡，外资撤离所致。中国2000—2007年对美出口由521亿美元增至2327亿美元，贸易顺差由297亿美元扩大至1633亿美元；而国内1999—200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74.7%下降至39.2%，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6%增至19.5%。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GDP下行已成定局。

众所周知，美国玩虚拟、玩预期、玩透支游戏之后，于2008年4月通过了一项金融改革法案，建立起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经济防火墙，防止美国金融危机引爆后其他国家收购美国经济实体，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美国的经济利益。因此，拥有大量美元及美国证券、国债、机构债的中国政府及殖民化企业，并不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通过购买美国经济实体以有效地规避风险，减少损失。

至于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及经济安全威胁，则明显存在于三个方面：

1. 中国经济被迫走“钢丝绳”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投入美国的外汇资产已逾万亿美元，超过了当初美国振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的2.5倍，相当于中国经济的三分之一。在虚拟经济泡沫破灭、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我国出口大幅下滑和工业增速持续回落的情况下，为了拉动内需，中国政府计划拿出4万亿元建设以改善民生、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10项措施。这是利好消息，但诺大一笔资金并非国库现有（截止2006年我国外债已超3000亿美元，内债不含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和乡镇政府的1万亿元，已超3万亿人民币。其筹资办法除了税收，离不开发行股票、债券，而股票泡沫的最终受害者，可能如同过去的多次股灾一样落到老百姓头上。2009年春节后中国股指在众多利好消息刺激下逆市而上，物价上涨，就业困难，经济风险重重，安全系数降低。

2. 外资具备在中国掠夺投资者的内外部条件

由于中国银监会和证监会均已同意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发行有价证券，更由于中国证券法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赔偿条款的法律，外资已具备直接在中国发行股票和债券并不负破产赔偿责任的条件。在美国金融危机中完成“泡沫压缩”和风险与财产相分离的美欧西方国家金融业，为转移目标，转嫁危机，不久将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或用衍生金

融工具套取中国资产，并在适当的时机象巴林银行那样宣布因投资失误破产而完成对中国投资者的掠夺。

3. 民族经济遭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美国出台法律保护经济实体不被收购，中国出台政策鼓励外资并购民族企业。中国制造业链低端的实体经济，近10几年几乎耗尽了国内各种资源，购买外国商标、专利和核心技术的企业却又把控制权交到了外国人手里，在中国股市获得几十倍利润的银行股份，却由于廉价出售（据悉仅2007年中国数家银行股份贱卖损失便超过一万亿元；中国银行向外资转让20%的股权价仅相当于当年利润的70%，而收购法国洛希尔公司20%的股权价格则相当于洛希尔公司当年利润的2.3倍）。而让外资掌握我民族经济的部分主动权。我国国民收入采用GDP指标，即使中国的产业企业都落入外国人手里，GDP仍然是显示增长。GDP连年增长的背后有多少企业、产业、银行股权易主，老百姓并不知道，而美国的全球战略却早已以掌控中国实体经济为目标。金融危机下中国的部分经济实体，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和政策保护，下一步便可能成为外资猎取的对象。甚至在美国继保护国内经济实体不被外资收购之后又采取措施保护本国产品，大造购买国货的舆论，我国的舆论却在总结金融危机中应当更加自由开放及外资在华并购的经验，连中央电视台主持人也在节目中主张中国应作出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完全不同的姿态，以教育美国人怎样做才符合WTO规则，才是拯救全球经济危机的正确之路。

三、国际金融制度改革对我国经济安全的作用

美国金融危机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与制度的问题，而且从国际法的视角，它违反了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到了不改革将进一步扭曲世界经济，损害各国经济安全的程度。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是，美国依靠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货币体系，将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转嫁到世界各国，各国通过与美国的贸易顺差形成美元资金的外汇储备，再用美元资金的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企业债、股票及金融衍生品并进入美国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资本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成为美元帝国虚拟经济的支持者，而美国则又以投资等形式拥有各国的资产（实体经济）。至于国际金融制度，一言而蔽之，即拥有美元的美国可以根据其需要印发美元而不受监督，这是一种匪夷所思，近乎荒唐的国际金融制度。但是，我国学界舆论曾经占主导地位的是不主张对它进行改革。不主张改革，甚至主张赴美救市的舆论大致有三：一是美国经济实力强大，触犯美国利益可能导致美国的最后疯狂乃至导致世界大动荡；二是美元为核心的体制由来已久，美元信用的崩溃将影响世界经济的稳定；三是我国进出口历年以美元结算，而且拥有巨额的美元储备，美元地位下降对我国经济稳定不利。

三种舆论均具有一定道理，代表着国内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违背了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30年，我们从美国学到了许多东西，唯独一样没有学习，即美国人的铁律、实践和标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国际规则服从于美国利益。

笔者认为：第一，美国经济实力依然强大不假，危机之后还是世界上的最强国；但是改革不受监管和束缚的美元核心体制，重订国际金融规则，是世界各国的强烈愿望，是大势所趋。也正因为美国经济依然强大，面对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洗牌，帝国不会因此而疯狂，奥巴马总统更不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承担世界动荡乃至战争的责任。第二，尽管美元核心体制已有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但这不能成为世世代代都必然尊奉美元核心体制的理由，就象当年美元取代英镑的核心地位一样，美元体制也总有被取代的一天，这是历史规律。第三，我国进出口以美元为基本结算方式本就过分划一，何况拥有巨额美元储备已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美国人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印发美钞来购买中国的资源、产品和企业股份，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维护这样一种印钞机式的个体金融体系呢？如果说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黄金和美元挂钩”对美元的印发还有一定的限制作用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作为国际货币体制的关键支柱的固定汇率制不复存在，就意味着美元发行不再受到黄金储备的客观标准的制约。正由于这种情况没有引起各国政府的充分重视，致使数十年来美元发行与实际经济脱节，并为一系列衍生性金融产品的泛滥创造了条件。往大处说，美国政府可以自主印发美元买下整个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难道这样一种金融体制还值得我们去维护它？而理由仅仅是我们手中还有1.9万亿的美元储备。

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行为不断。2000年2月14日在泰国曼谷爆发的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矛头就直指IMF。2000年4月16日在华盛顿爆发的游行，则抗议IMF和世界银行年会的召开；同时在哈瓦那举行的77国集团首脑会议，东道国古巴主席卡斯特罗在会上呼吁“毁掉”IMF。2000年9月下旬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召开的世界银行和IMF年会，示威者更要求关闭世界银行，解散IMF，加快改革国际金融体系进程。2002年11月9日在佛罗伦萨的上百万人举行的反全球化示威游行的口号有“打倒国际金融资本”。尽管如此，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制度绝非易事，它可能遭到美国方面包括政治、外交的巨大压力。但我们应该看到，除美国外绝大多数国家是赞

成改革的。何况我们历来主张分阶段，循序渐进。笔者以为，现阶段哪怕仅仅采取以下措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也是十分有利的。

1. 调整对外贸易制度，以多元体制代替美元霸权

美国金融危机的性质，决定了美国的最大损失是各国失去对美元霸主地位的信任。在这个时候，并不需要 IMF 召开会议决定，一个多元并存的体制必悄然酝酿、产生并在实践中逐步发展，最终将代替美元一家独大的国际货币体制。在这样一种契机下，中国为经济安全体，可适当调整对外贸易制度，在对外贸易中采取价格设限和多币结算，尤其是采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方式，建立主权货币。同时适当减少美元储备的份量，增加欧元、日元的持有。如果对外贸易采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就会形成对人民币的巨大需求，导致人民币的加速升值。这不仅有利于推动国际金融体制的改革，有利于减少美元泛滥的风险，而且会大幅提高国民的收入，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2. 谋求国际金融规则的修改，促进国际金融体制稳定、有序、合理发展

现行国际金融体制是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主导下建立的，体制中 IMF 偏离了其应有的代表性和中立性，一个国家发言权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相关国家凭借经济实力而认缴的份额，而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优势取得很大的话语权和表决权，国际金融规则完全按照发达国家的意志而制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发言权和表决权甚微，我国在 IMF 中所占有投票权在 2006 年才提升至 3.72%，远低于日、德、法、英（他们分别为 6.04%、5.90%、4.87%、4.87%），对国际金融事务的决策率与影响力十分有限。而美国在其中的投票权高达 16.83%，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利，欧盟的德、法、英占有的投票权达 15.64%，同样具有一票否决的权利（IMF 任何决议表决都必须有 85% 以上的投票率才能通过）。

国际金融制度的改革，首先必须改革这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操纵 IMF 投票、决策、监管的表决制度；其次，调整及协调 IMF 作为危机防范人、危机贷款人、危机管理者的角色，充分发挥其监管、预警、防范金融危机的作用，提高其提供政策性建议对危机防范与化解的能力，改变任由美联储长期充当“世界央行”职责，任意发行美元及金融衍生品的局面。第三，重新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则，建立新的工作制度以防止其运作监管过程中的随意性及不公正、不合理性。作为世界经济大国之一的中国，有责任促进规则导向型的国际金融制度的形成及整体性国际金融管理体系的建立，实现国际金融制度的功能从保障强权到限制强权的过渡。而实现这一目标，不仅要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国家，而且要团结欧盟等发达国家，大家一起参与对 IMF “软机制”的改革，全面修改 IMF 管理职能与金融职能发挥的“弹性”条款，强化 IMF 的监管职能和防范功能，体现程序和补救措施，加强其在对全球金融进行监控和管理过程中的控制性和威慑性，并通过引入司法程序，增强其组织的权威性及公正性。

四、与中国经济安全相关的主流经济理论

多年来流行的我国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著名的注解是“以市场为杠杠”。在这种扭曲了的理论指导下：（1）中国重点发展重化工业，致国内能源增长率远远低于经济增长率，石油和天然气供不应求（已探明的我国石油储量仅 25 亿吨，不足国内 10 年的需求），47% 的石油消费依赖进口（2006 年进口 1.5 亿吨），但是中国消耗的能源与日本相当，经济总量却只有日本的一半。（2）农村城镇化、工业化与成年劳力外出打工，造成可耕地数量锐减（降至 18.2 亿亩，逼近国家规定的 18 亿亩红线，人均均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和农村生产力下降，人均粮食产出持续在低水平徘徊。（3）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导致固定资产投资过大，货币供应过多，粗放型制造业盲目发展，仅不足万分之三的企业有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只占 GDP 的 40%，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 68%，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的 52%。（4）过分依赖市场自由调节功能，造成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全国 8 个富裕省份的收入是其余 22 个省份的 3 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已扩大到 3.3:1（2006 年），而世界平均城乡水平是 1.8:1；（5）环境与自然资源，由于长时间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及低效能的环境治理，国内自然资源遭受破坏，环境恶化，水资源短缺，自然灾害增多已是不争的事实。据有关数字显示，中国的 GDP 只占世界总量约 4%，但石油、煤炭、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费分别占世界的 7.4%、31%、30%、25% 和 40%，成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之一。而由此产生的环境问题，却导致国家每年损失 2000 亿美元，占 GDP 的约 10%。（6）被扭曲了的市场经济理论与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相吻合。2006 年我国宣布建立“和谐社会”，标志着发展重点从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向社会和谐转变，要改变社会供应低于社会需求的“社会赤字”。

在经济已经市场化，但市场缺乏调节平衡机制，主宰市场经济发展和膨胀的不是政府，而是跨国公司和利益集团时，我们关注德国科学家阿尔诺·彼特提出的等值经济理论。等值原则来源于古典价值理论，原为包含在产品中的直接或间接劳动时间的评估产品价值的方法，彼特把它发展成为一种经济理论，并以《等值原则：全球经济的基础》为题发表论文，墨西哥城首都自治大学教授海因兹·迪德里齐（2001）认为“等值经济原则将取代当前居统治地位的国家市

市场经济理论”。彼特在他的论文中论证了“市场经济是非等值经济，它不可避免地要引向人剥削人、社会财富集中和个性疯狂”。他认为市场经济不是“经济”，不是通过改造大自然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而是亚里士多德称之为“金钱经济”的东西，即把经济从一种服务于社会的子体系蜕变为以牺牲大多数人利益为代价的牟利机器。

彼特批评市场经济的弊端是中肯的，如他批评市场经济正在成倍地消耗那个大自然中可以自生的资源是以“牺牲下代人为代价的无度滥用”的经济，预言“在全球经济时代，等值原则使人类可以不再把她与大自然的关系建立在经济与剥削的基础上”等均是有价值的。但他提出的等值经济原则并不是成熟的理论。

五、结论

无论是华尔街新自由主义精英们描绘的金融蓝图，还是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实际奉行的经济政策，抑或各国为救市抛出的种种刺激措施，它们都是用一种非等值经济的原则在进行思考，国际金融体系的形成和规则的制订，更建立在一种非等值的经济理论上。因此，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与制度，防止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到来，保护各国经济安全，首先必须考虑用一种新的经济理论为指导。尽管本文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这样一种经济理论，但笔者认为，新的经济理论必须建立在等值原则的基础上，比市场经济理论更为公正、公平和公开，这是我国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目标所决定的。美国式市场经济理论与美国的巅峰经济一样，最终都会成为过去。而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的经济活动不等值，就谈不上社会公正、世界公平，谈不上社会和谐、世界和谐。

注释：

- ①参见《建立公平合理国际金融新秩序》，《国际金融报》2008-11-7。
- ②吴敬琏：《世界金融体系出大毛病，中美状况互补》，《新快报》2008年11月4日。
- ③肖炼：《国际金融体系能否改弦更张》，《国际商报》2008年10月23日。
- 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中国政府白皮书（5）》，北京外交出版社2008年版，第395页。
- ⑤胡锦涛：《在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九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08年6月23日。

[参考文献]

- 海因兹·迪德里齐等著，徐文渊译（2001）“全球资本的终结：新的历史蓝图，”人民文学出版社。
- 何天云等，（2004）“全球化与资本主义问题研究，”重庆出版社。
- 邱晓华，（2008）《中国经济新思考》，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 沈木珠，（2002）《国际贸易法研究》，法律出版社。
- （瑞士）梅林德，（2008）“经验、挑战和政策建议：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三十年，”《世界经济研究》第12期。
- 田伯平，（2008）“美国次贷危机与金融经济新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第6期。
- 夏善晨，（2008）“国际资本市场的合作与政府监管的规制，”《国际经济合作》第11期。

（责任编辑 郑宝银）

Empirical Study on China Economic Security and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QIAO Sheng

Abstract: The American financial crisis reflects that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does not only violat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but also actually threaten China Economic Security. Although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must persist in the theory of stage in practice and take into account the core position of US dollar formed for several decades, the objective and direction of reform are not allowed to be reversed. The guiding idea must be set up on the basis of economy of equal value, and does not persist in pursuing the theory of market economy and the new liberalism of American style.

Keywords: Financial crisis; Economic security;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Economy of equal value; New liberalism